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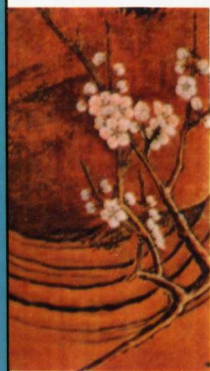
著者／刘志诚

汉字与华夏文化



巴蜀書社





封面设计：邹小工

ISBN7-80523-662-3/H·22

定价：9.50 元

著者 钱正斌

汉字与华夏文化

(川)新登字 008 号

责任编辑:陈大利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面设计:黄汉庭

汉字与华夏文化

刘志成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东方福利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 插页 字数 180 千

1995 年 5 月第一版

1995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690 册

ISBN7-80523-662-3/H·22

定价:9.50 元

序

张世禄

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二年，我又开始招汉语史研究生。我和严修老师共同招了三名学生，其中有一位东北人就是刘志成。开始上课，他连我的带有南方口音的普通话都听不懂，至于区分古音的清浊、入声只能靠死记硬背，学习音韵学的困难可想而知了。但他除了坚持听规定的研究生课之外，还学习三门外语，通读《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和《金文诂林》，抄写《金文编》。他对我说，要把上古音和古文字结合起来研究。凭着他的顽强毅力，终于以优良成绩结束了课程学习，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两周金文音系的声母系统》，通过了答辩。

毕业后他去了武汉，在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理工大学）语言研究所工作。在三年时间里，他跑遍了全国著名图书馆，查阅了一两千种文字学书，积累了近百万字的资料，给研究生开设了《中国文字学发展史》课程。1984年他调到四川师范大学，先后给中文系的学生讲授古代汉语、文字学、训诂学，给研究生讲授汉语音韵学研究导论、文化文字学、语言学研究方法引论，撰写了几本书稿。现在刘志成已经是汉语言学副教授。从他走过的道路可以看出，他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研究是扎实的，他在古代汉语各个领域都作了辛勤的探索。作为导师，我为他的成

长感到由衷的高兴。

1923年我写过一篇《文字上之古代社会观》(载《国学丛刊》一卷二期),提出:“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吾国。则此文字者,诚有史以前先民遗迹之所留,曷借之以窥其政俗之梗概,以补史策所未及者乎!”六十多年了,学术不断发展,文字学、考古学、人类学成果斐然,我一直没有精力再系统研究这个课题。刘志成的这本书,从华夏文化这个大视野考察汉字的发生、性质、演变,又从汉字形体结构证明华夏史前文化。由我的学生完成了我几十年前提出的课题,我深感欣慰。巴蜀书社愿意出此书,我非常感谢!

我年事已高,目力不济,且四川与上海路途遥远,不能通读他的书稿,他的研究成果究竟如何,只有等待书出版后,请语言学界的朋友们评说了。

1990年9月于复旦大学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汉字产生之谜的文化解释	[11]
第一节 汉字在华夏文化发生序列中的位置	[11]
第二节 汉字产生前之记事传说的文化解释	[16]
第三节 汉字产生神话传说的文化解释	[23]
第四节 从考古资料来考察汉字的形成	[28]
第三章 汉字的性质与华夏文化的契合	[33]
第一节 世界上文字的主要类型	[33]
第二节 历史上关于汉字优劣的争论	[37]
第三节 汉字的性质	[39]
第四节 汉字的性质和华夏文化的契合	[42]
第四章 汉字结构、字体流变与中国社会	[50]
第一节 汉字六书和华夏先民的思维	[50]
第二节 汉字的字体流变	[65]
第三节 汉字的整理与简化	[70]
第五章 古文字形体——华夏史前文化的投影（上）	[76]
第一节 华夏先民的生存环境	[76]

第二节	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	[87]
第三节	华夏民族的形成	[97]
第四节	婚姻家族及风俗	[103]
第六章	古文字形体——华夏史前文化的投影（中）	[119]
第五节	居邑、饮食和服装	[119]
第六节	交通	[139]
第七节	原始公社的经济发展	[143]
第八节	私有制、阶级的产生和原始公社的解体	[160]
第七章	古文字形体——华夏史前文化的投影（下）	[173]
第九节	原始思维和原始宗教	[173]
第十节	科技的萌芽	[189]
第十一节	原始艺术	[204]
参考书目		[213]
后记		[215]

第一章 绪 论

一、文 化

在我国传统典籍中，“文化”指文治和教化。汉·刘向《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文化不改”意思是用纯德文治和礼乐教化仍不能改变对方的不归服状态。“文化”的这种意义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的，大家较为熟悉的意义是明治时代从日本传入中国的。

明治时代的日本学者，用日语汉字“文化”来翻译英语 Culture。英语的这个词，与德语 kultur，法语 Culture，都来源于拉丁语 Cultura，本义是耕作、栽培，阴性名词。这本是指为了满足人类自身的物质需要而进行的衣食生产活动，十八世纪以后，又引申指人类的精神活动，包括社会知识、个人教养、著作等，进而指一定社会的所有生活内容。现代汉语“文化”泛指一般知识、文艺等，是受日本汉字译词影响的结果。

哲学上的概念，虽然不能用词义引申来解释，但大多还是有联系的。

关于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有人统计到 1952 年，就已有一百六十多种。现在估计可能有几百种。笔者所见到的一些定义，如果以概念的外延来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有限定为人类精神活动方面的，如 1978 年版西班牙《世界大百科全书》：“文化就是

在某一社会里，人们共有的由后天获得的各种观念、价值的有机整体，也就是非先天遗传的人类精神财富的总和。”有包括物质、精神两方面的，198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简明社会科学辞典》：“文化，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有泛指人类社会一切活动的，1973年版《苏联大百科全书》：“文化是社会和人在历史上一一定的发展水平，它表现为人们进行生产和活动的种种类型和形式，以及人们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以概念的方式来划分，有描述文化外延的，有规定文化性质的，有阐述文化功能的，有探求文化发生演变的，有强调文化解释作用的等等。

在人类学领域中，早期具有广泛影响的定义是英国人类学家、古典进化论学派创始人之一泰勒（E·B·Tylor 1832—1917）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的：“文化或文明，就其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以及习性在内的复合整体。”这个定义被人类学家尊为文化的经典定义，在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泰勒对文化特性的认识：（一）超自然性，文化不是世界自然的形成物，而是与人的活动有关的。山光水色、树木花草，如果没有人参与和欣赏，不能独立地成为文化。（二）超本能性，文化不是人类先天遗传下来的，而是作为一名成员在社会活动中后天习得的。婴儿降生吮吸母乳，不具有文化意义。（三）综合性，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等方面的任何一个内容，都不能简单地称为文化，而是这些方面的复合整体，是个统一的体系。（四）侧重精神方面而排除了物质内容，这和十九世纪人类学家的研究重点有关，那时人类学家的兴趣在原始部落的宗教信仰、神话传说、道德艺术、氏族婚姻等精神方面。

今天，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已经扩展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再仅是通过原始部落的调查来探讨人类社会的早期进

化问题，而是通过更广泛的人类社会研究，试图解释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成因。泰勒的定义局限于精神方面显然是不够的。

美国人类学家克鲁柯亨（C·Kluckhohn 1905——1960）于1945年和凯利（W·H·Kelly）合写的《文化的概念》一文中说：“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系统，既包含显形式样，又包含隐形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者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这个定义与泰勒的定义相比，有很大差异：它明确指出文化是个系统，并且有层级性，文化所包括的内容，并不是都处在同一个平面上，是有层次的；尤其强调文化的超个体性，具有整个群体或群体中特定部分共享倾向的行为、习性、意识形态等才能成为文化内容；概括的范围也更为广泛，凡是人类历史所创造的都算在内，包括物质方面、精神方面、各种关系等等。

如果我们将这两种定义综合在一起，那样关于文化的概念就是我们比较满意的了。泰勒的定义采取了概念外延描述方式，克鲁柯亨采用系统观察结合概念内涵方式，想从字面上进行综合是困难的，只能在克鲁柯亨的定义基础上稍加补充，如可指出“这种倾向是后天习得的”等。

二、文 字

这里讲的文字是指汉字。

汉·许慎《说文解字》：“文，错画也，象交文。”“字，乳也，从子在宀下，子亦声。”“文”是象形字，甲金文象人的正面形，中间并有交错花纹，表示在人的胸腹部纹身，楷化字中间部分已被略去。文的本义是纹身，许慎所指出的“错画”。（交错花纹）是引申义。“字”是会意字，象房屋内有子，妇女怀孕或生孩子为其本义，“乳”即生殖的意思。

许慎《说文解字·叙》：“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

而浸多也。”^①按照许慎的意思，从描摹物体的图画而演变来的象形字和由象形字添加符号的指事字，字形结构是独体的，叫作文。这是从纹饰引申为物象意义的。其后的象形字、指事字，添加符号而成的会意字，即所谓形相益；添加声符而成的形声字，即所谓声相益，形体结构是合体的，叫作字。这是从字的生殖义引申为文字形体孳乳意义的。并且以为“文”是仓颉初造汉字时的形体，“字”是后来“文”发展的结果。

许慎的说法对后代影响很大，未必是独创，可能是汉代经学家的通行看法，先秦时代并不如此。

《左传·宣公十二年》：“夫文，止戈为武。”《左传·昭公元年》：“夫文，皿虫为蛊。”（繁体字虫和蛊都写成三虫）武和蛊都是合体会意字，《左传》叫作文而不称为字。《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称文字为“名”（“策”和“方”都是形状不同的竹木简）。《荀子·解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称文字为“书”。

“文字”连称始见于秦的琅琊刻石：“书同文字”。

语言通过声音与意义相结合的形式来代表事物，而与事物本身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语言是符号系统。文字是通过书写形体与语音相结合来记录语言，形体与语音也没有内在联系，所以文字也是符号系统。但语言本身就是符号系统，所以文字可以说是二级符号系统。但汉字还有自己的特点。

汉字不是纯粹的音素符号，它兼有表音、表意两种功能，它既是记录汉语语音的书写符号系统，又是直接表示部分语义的书写符号系统（形声字表示的只是语义类目），所以汉字是具有记录汉语语音和表达语义层级作用的书写符号系统。这里的层级作用，是指表音、表意功能属于不同的符号层级。这个定义和许慎的说法不同，许慎是从汉字的发生角度“仓颉之初作书也”讲的，我们是从汉字的功能出发的。汉字是书写符号，对汉字的识别是由视觉感知的，是通过“看”而读出汉语语音的（这一点和世界上

所有的文字都一样)。但汉字具有表意功能，能“看”出意义来，有时会出现知其义而不知其音的有趣现象。汉字是系统，就必然有内部结构、关系和自我调解功能。

三、文 字 学

文字学与文字不同，它不是以具体的个别字为研究对象，而是把文字作为一个体系来研究，它研究的是文字这一书写符号系统的性质、结构、功能、起源、演变规律和前途。

汉语文字学，现在已经产生了很多分支。传统文字学，以讲解《说文解字》为主，涉及六书、五百四十部首、形体流变等。汉魏以来的经学家，所谓懂文字，就是学习《说文解字》。民国初年出现的文字学讲义之类，有人把文字学理解为传统小学，所以才有了钱玄同《文字学音篇》（北京大学 1918 年印，等于今天的音韵学）及计划中的《文字学形篇》（即今天的文字学）、《文字学义篇》（训诂学）等叫法。受此影响，杨树达写过《文字形义学》，高亨写过《文字形义学概论》。近年出版的这类著述，则称为文字学或汉字学了。

古文字学，以出土的古代文字资料为主，结合历史、考古，研究特殊的古文字形体变化规律、考释方法、各种古文字的特殊问题，涉及甲骨文、金文、玺印封泥、石鼓、竹简、帛书等。近年，这类著述成就丰硕。如唐兰《古文字学导论》、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等。

现代文字学，研究汉字的现代化问题，包括汉字的规范、简化、改革及计算机信息处理等。关于汉字输入计算机编码一类著作已很多，但目前国内还没有研究汉字现代化问题的理论专著，我们只见到周有光先生《现代汉字学发凡》（载《语文现代化》1980 年第二辑）。

此外，书法、篆刻、美术字一类的书很多，各成体系，研究怎样把汉字写（或刻）得美。可以总称为审美文字学。

四、汉字和华夏文化

汉字和华夏文化的关系的研究，能够建立一个新的文字学分支，可以叫作文化文字学。它属于文字和文化的边缘学科。它研究文字和文化的关系：一是从文化角度看文字，研究华夏文化对汉字起源、演变及结构形成的作用；一是从文字角度看文化，研究汉字的性质、功能对华夏文化的适应程度及汉字对华夏文化的反映和作用。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自然使人们联想到语言学的一些新的分支学科。如社会语言学，能否由此建立社会文字学呢？社会语言学侧重研究语言变异及社会环境、阶层、文化交流的关系，文字体系比语言稳定，社会环境、阶层、文化交流对文字形体流变影响远远小于文化因素的影响，而且其影响也需要得到全社会的承认才能存在。文字与语言不同，行业语可以在行业内存在，行业字想要流行远比行业语困难，尽管近年来发现了所谓“女书”，但那是极特殊的个别现象，至于宗教符号、专业代码等，不能与一般文字混为一谈。所以目前尚看不到建立社会文字学理论体系的前景。

文字本来属于文化范畴，本书谈文字和文化的关系，这里的“文化”自然排除了文字。

五、汉字与华夏文化所涉及到的研究内容

（一）文化对文字的起源、结构的形成和形体流变的作用。汉字是华夏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华夏先民的思维能力、语言发展、事物记号的储存传递要求、宗教观念、负载符号物体的质料水平等都有密切关系。汉字的六书，是远古华夏先民思维水平的体现，也是汉语特点制约的结果。汉字，由甲、金、籀、篆而隶、楷，演变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发展对信息传递的更高要求。

（二）汉字的性质、功能对华夏文化的适应。汉字到底是什么

性质的？清末至今，一百多年来，误解占了上风，“表意文字落后”几乎成了定论，从近代有民族忧患意识的人到当代政治家，有多少人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误解汉字的行列。今天，只是就汉字性质进行争论是不能清除这种错误影响的，需要从文化角度来判定汉字的性质、功能及其对华夏文化的适应程度。文字与语言的关系，过去一般只注意文字记录了语言，而对文字性质适应语言特点注意不够，对文化的适应涉及就更少了。

（三）汉字对华夏文化的作用。汉字不仅记录了历代大量哲学、科学、文学、史学等成就，而且积极参与了华夏文化的创建。汉字对中华大地汉民族文化同质性的形成，及维系有复杂方言差异的汉民族团结，以致于维系华夏各民族的团结，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还有书法、篆刻艺术，更是由于汉字而形成的民族文化瑰宝。

（四）汉字对华夏文化的反映，这里不是指汉字记录了华夏文化。发现的甲骨文约有四千个字，能识的尚不足一半，而今天出版的《汉语大字典》有五万六千个字，这些字的形体结构，可以说是华夏文化的沉积物。特别是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形体，几乎全面反映了华夏史前文化和商周文化，大多能和考古资料相印证。有些史前抽象观念，只凭考古方法是难以判断的，而古文字形体却是独家资料，这也是汉字比一般音素文字优越的地方之一。

六、文化文字学的研究方法和意义

文化文字学的研究方法是综合了文化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的方法，并有自己的特点。

资料收集，有实地调查、考古资料收集、典籍文献汇录等。实地调查主要是对少数民族部落的社会调查，特别是与外地交往少的“孤岛型”村寨，价值更大。调查内容应该广泛些，包括历史变迁、生产方式、阶级关系、亲属称谓、姓氏宗谱、风俗习惯、宗教神话、语言文字、科技水平等，尤其不要忘记概括能力、思维

方式的考察。中国大陆五、六十年代的调查报告，因为受直接服务于政策需要的影响，大多侧重于阶级关系方面，今天看来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实地调查还有对当代社会汉字使用、俗体流行情况的调查，以用来帮助判定汉字的适应能力和未来演变趋势。

考古资料的收集，包括收集古代社会研究成果（重点是史前史和先秦两汉）和古文字研究成果。

典籍文献汇录，有关华夏文明的神话传说、上古社会情况、古代字书、经籍古注等，也要注意现在的人类学研究成果。

资料的整理，包括分类、辨伪和选择。

最后是分析、综合，当然也有演绎、归纳。其中有文化类型分析、发展规律概括、传统语言学方法等。

理论方法主要是历史主义的现象学方法。

这些只是大致过程而已，遇到具体问题并不这样简单。本书也只是初步探索，在这上做得并不够。

通过汉字与华夏文化的研究，建立文化文字学的意义，首先是大大扩展了文化和文字的研究领域。文化通过文字，开拓了视野，丰富了资料；文字通过文化，增加了研究角度。其次，有助于揭示文字发生和发展机制。汉字是怎样产生的？只有从华夏文化发展的角度来探求，才有可能更好地解开这个众说纷纭的千古之谜。汉字的演变规律和未来前途，只有站在文化角度，才能作出正确的回答。这样，也能给汉字规范政策提供参考意见。再次，对汉语文化语言学的建立奠定坚实基础。现在，国内一些中青年语言学者，掀起了文化语言学热潮，我以为应先做些基础工作，先研究文字、音韵、方言、训诂、语言理论与文化的关系。

七、文化文字学提出的背景

传统文字学的研究在清代达到了高峰，在《说文解字》的校勘、发明义例、疏证、声义关系等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研究成果，所谓《说文》四大家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就是这些成

果的主要代表。清末以来，靠考据方法对《说文》进行研究，虽然时有发明，但总的来说，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文字学家的兴趣转向了古文字。

清代小学家继承了宋人开始的古文字资料收集事业，有不少成就，阮元、潘祖荫、吴大澂、刘心源等就是其代表。清末甲骨文的发现，使古文字研究走向了科学道路，民国时期出现了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同龢所谓“四堂”。罗雪堂、王观堂的研究仍然有浓厚的考据派特色，董彦堂多次参加野外考古挖掘，甲骨文著述多与考古相结合，郭鼎堂声明：“余之研究卜辞，志在探讨中国社会之起源，本非拘拘于文字史地之学。”^②“四堂”的成果虽然不能称作古文字研究的顶峰，但确实是代表了古文字的学术发展方向。

新中国成立以后，祖国传统文化研究备受“左”的政策打击，但古文字研究停滞时间较短，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相比，成绩显然大得多。孙海波《甲骨文编》（1964年改订本），容庚《金文编》（1985年第四版），罗福颐《古玺汇编》、《古玺文编》（1981），商承祚等《先秦货币文编》（1983），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1978—1985），正在编辑出版的《金文合集》，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1955），《古文字研究》辑刊等，是这些成果的重要部分。不只老一辈古文字学家胡厚宣、于省吾、容庚、商承祚、徐中舒等人继续有所建树，而且涌现出一批卓有成就的中青年古文字学家，裘锡圭、李学勤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这些著述从深度和广度上都比“四堂”时代大大前进了。也给利用古文字开辟新的研究方向提供了条件。尤其是郭沫若联系古代社会文化研究古文字，给新的研究方向以启示。

文化人类学是清末传入中国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进入了初步繁荣阶段。林惠祥、费孝通是有开拓功勋的学者。五十年代大陆开展了颇具规模的民族调查，成就可观，但有粗疏不够全面的缺点。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是众所周知的学术基本停滞